

沈 潜 唐文权 编

宗仰上人集

赵樸初题



●章开沅 主编

●辛亥人物文集丛书^⑨

章开沅 主编
辛亥人物文集丛书

宗仰上人集

趙樸初題



沈 潜 唐文权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仰上人集/黄宗仰著 沈 潜 唐文权编.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8

(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章开沅主编)

ISBN 7-5622-2168-5/C·37

I. 宗…

II. ① 黄… ② 唐… ③ 沈…

III. 黄宗仰—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1683 号

宗仰上人集

◎ 沈 潜 唐文权 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李晓明

封面设计:甘英

责任校对:崔毅然

督 印:朱虹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43 千字

版次: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由于唐文权同志的倡议与努力,这套丛书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就出版了第一部文集——《雷铁崖集》,而且迅速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得到各界人士越来越多的关心与支持。

读者也许会感到有些奇怪,许多著名辛亥人物的文集已经纷纷出版,或者正在编辑与出版过程之中,为什么还要另编一套《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呢?我们的想法是:辛亥革命是一个群星升起的时期,当年许多仁人志士的言论文字,与他们的社会实践一样,都充满着时代的激情,焕发出灿烂的光华。其中一些特别著名的人物,诸如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蔡锷、廖仲恺、朱执信等等,早已有人编辑刊印过各种版本的文集,而且现在又不断有更齐全、更完善的新版文集相继问世。倒是一些知名度稍低的人士,或则因为早逝,或则由于其他一些说得清或说不清的原因,他们的众多诗文至今还散存于各种报刊乃至稿本之中,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加以访求、搜集、清理、编辑、校勘、出版,为研究者提供若干方便,至少可以减免一些奔走寻觅之劳。

辛亥革命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它是由数以万计的新兴知识分子的群体协同发动与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仅只局限于个别领导人,而应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与社会层面。当年许多仁人志士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与历史使命感,自觉地肩负祖国的安危,以天下为己任。他们抛妻别子,去国离乡,牺牲个人与家庭的幸福,追求祖国的独立富强,甚至奉献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但是,并非所有的仁人志士都曾受到历史学家应有的注意,有些名字甚至很少被一般

历史著作提到。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没有值得流传的英雄业绩与曾经闪耀过光彩的思想。或许可以说,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主要就是为了保存和流传他们那些可贵的但却长期被后人忽略以至遗忘的言论与事迹。我们的编辑工作是平凡的,甚至是平淡无奇的,也许很难引起什么大的轰动。但它又是各项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基础,我们深信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将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理解。

需要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大家都说出书难,而出版历史资料书籍更难,讲穿了就是难于筹措出版必需的经费补贴。我们的计划不仅是出一本,而且是出一套数达几十本的历史资料性质的丛书,难度当然就更大了,甚至于可以说是自找苦吃。在当今的条件下,政府和学校所能提供的资助,毕竟是微乎其微的,必须寻求多种渠道,探索一些比较灵活的变通办法。我们认为比较现实可行的办法之一,就是寻求与文集作者有关的地区与社团的支持与帮助,包括这些作者的后人与亲友的支持与帮助。保存历史文化遗产,乃是全民的共同事业。政府当然是主要责任的承担者,但处于这样大的国家,确实难以把任何事情都包揽下来。而社会上又不乏乐于共襄善举的慷慨好义之士,我们应该积极争取并热烈欢迎他们的合作。这套丛书所出的第一本书《雷铁崖集》,其所以能够迅速出版,就是由于作者的后人与自贡地区的朋友们率先提供了及时的支持与资助。我们殷切

地期待着有更多的地区、社团、个人通过各种渠道与各种方式来关心与支持这套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是个完全开放的园地,我们欢迎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来稿。只要是符合丛书的宗旨、范围并有出版价值与经费来源,我们就一定尽快审阅修订发稿,力争早日刊行问世。当然,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也很缺乏,希望大家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使这套丛书越出越好。

章开沅

一九八七年盛夏于桂子山

编辑说明

一、本集系据编者目前所见宗仰上人散见于《同文消闲报》、《新民丛报》、《江苏》、《苏报》、《政学报》、《女学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大共和日报》、《佛学丛报》、《文艺俱乐部》等报刊上的诗文以及有关书籍、采访所得收辑而成。

二、本集以诗文分列编排，各件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凡原文时日难考确实者，则注明约撰年份。

三、本集各件，均予标点。作者原注以（ ）标明。凡误植者，下加 []；凡脱字者，下加 〈 〉。并将正字、脱字注入其中。凡残缺不全或字迹模糊难辨者，用□表示；凡衍文，以【 】标识。

四、本集所辑诗文，均注明来源、发表期刊、作者署名；手札抄件附志出处。

五、本集各件均采用原有标题。若原先无标题者，则由编者根据内容酌加，以※注明。

六、本集另将与宗仰上人有关的传记、序文等重要资料作为附录，或系于原文之后，或附于集后，以供研究参考。此外，编者另撰《宗仰上人年谱简编》附载于后，以便读者检索。

七、本集作者笔名较多，除一般常见的乌目山僧、中央、楞伽小隐、宗仰上人等署名外，另有中央半圭道人、金山寺客人（支客？）存疑待考（见陈玉堂《辛亥革命时期部分人物别名录》）。故以此署名的文字，如刊于《鹭江报》（45）的《鹭江竹枝词》等，暂不收入。

八、因时代变迁，有关报刊或年久散佚，或藏而不全，虽经

序一

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代序)

——1903年的国内革命思潮

章开沅

近日检阅辛亥以前旧报刊,在《江苏》杂志第五期“文苑”栏,录得署名“中央”诗三首。

其一,《〈驳康书〉书后》

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虎伥,麟起咬之暴其肠。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胡牛瞎骑逐臭忙,兔引狐牵金满装;喻犹一盲导犀盲,夜半冲暗投深坑。投深坑,自作殃,一颠再蹶徒心丧。独立帜已飏霄光,国仇誓雪民权昌,昆仑血脉还系黄。呜呼噫嘻南海康!

其二,《〈革命军〉击节》

海飞立兮山飞拔,西州男儿有英骨,笔铁口血血茫洋,昆仑吐气气郁勃。祖国沦胥三百年,九世混迹匈奴族,杀吾父兄夺吾国,行行字字滴鲜血。悲不胜悲痛定痛,誓歼鞑靼非激烈。革命革命真英雄,一书英法真传译,光芒电闪泰西东,咸识汉人有豪杰。曷哉神州好男儿,种族安危不容发,终宵思之眠不成,寒窗剑影一痕血。

其三,《伐中山》

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妣河山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邗水奠新都。伫看叱

咤风云起，不歼胡虏非丈夫。

“中央”即黄宗仰。冯自由《乌目山僧黄宗仰》称：“宗仰又号中央，后称印楞禅师，江苏常熟人。生而颖悟绝伦，自幼博览群籍，尤工诗古文辞，旁及释家内典，因飘然有出世之想。年二十，出家于清凉寺。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为之摩顶受戒，锡名宗仰，自署为乌目山僧。以研精佛理，工兼绘事，渐为世人所知。时上海犹太富商方构筑爱俪园于静安寺路，其夫人罗迦陵崇信沙门，斥巨资，就其园建设经堂，延致群僧讲授梵典，募山僧名，特礼聘主持讲座。山僧应邀莅沪，受罗夫人香花供奉，几于无言不从。”^①但是山僧寄寓上海犹太富商园中，并非仅仅讲授梵典而已，他出家而未出世，偏偏要过问国家大事，参与政治斗争。壬寅（1902年）春，他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以后并被推为会长。南洋公学罢课风潮以后，蔡元培和退学生创立爱国学社，他也极力支持。据文献记载，教育会和学社的经费，都曾得力于他劝说罗迦陵捐助。甚至连浙省大学堂退学生自建新民塾，他也劝说罗迦陵给以资助。

上面这三首诗大约写在癸卯（1903年）6月，因为《江苏》第5期是在这年7月1日发行的。时在《苏报》案发生，章、邹被捕，乌目山僧和陈范等因受牵连而逃避日本之后。

三首诗分别讲三个人和三件事。

第一首诗是赞扬章太炎和他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山僧与太炎的结交，应是通过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章氏于壬寅3月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6月回国，旋返杭从事《诂书》“删革”并探讨《中国通史》体例。直到癸卯2月，他才到上海在爱国学社教三四年级国文。与山僧的交往频繁，相许为知己，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十多年以后，章太炎曾追述过这段往事：“当清光绪末，海宇多故，士皆瞋目扼腕，道执政无

^① 《革命逸史》第3集。

状,虽宴游未尝衰,而上海舟舆之会为尤剧。是时禅师自上江来,以绘事识诸名士,论议往往及时政,皆中症结。诸名士尽愕眙不知其所从来,良久乃知为金山江天寺僧也。余时粗涉释典,且好事,以是得与禅师游。顷之,余以《驳康有为书》贬绝清室,与邹容同下狱。禅师百方为营救,率不得。”^①事实上山僧自身也已经被列入清方搜捕名单,所以在营救无效之余只有避往日本。

《〈驳康书〉书后》一诗,是对《苏报》案文字狱的愤怒抗议,是对腐朽透顶的清政府的公开挑战,也是对被捕入狱的志士们的道义声援。此诗表明山僧具有强烈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他划分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揭露了康有为之流阻挠革命甘“为虎伥”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满怀信心地预言了清朝必亡和民权必昌的革命胜利前景。文艺的触觉是很敏感的,在癸卯这一年,尽管大的革命风暴还没有到来,但类似《〈驳康书〉书后》这样振聋发聩的诗歌,已经是此唱彼和,蔚然成风,宛如傲霜斗雪绽蕾怒放的迎春花。人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感受到山雨欲来般的磅礴革命气势,它们无愧为时代的号角。

诗句朴素无华,直抒胸臆。“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虎伥,麟起啖之暴其肠。”如同行云流水一样通畅明晓地颂扬了章太炎对于保皇派头子的战斗,简直无需再作别的什么解释。

唯一需要稍作说明的,是为什么把章太炎比作啖狼之麟。首先当然是因为章氏名炳麟,麀是麟的异体字。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章氏当时已经以中国文化继往开来的宗师自居,因此麀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极端推重之词。章太炎在狱中曾经说明过自己闷大恣肆的抱负:“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不任宅其位,系素王素臣之

① 《栖霞寺印樗禅师塔铭》,《制言》第10期。

迹是践，岂直保守残阙而已。又将官期财物，恢明而光大之。还未得遂，累于□国，惟□翼□欤？^① 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困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章氏的知交和学生大都熟知个中底细，所以柳亚子《癸卯冬日有怀太炎威丹》也有这样的口气：“泣麟悲凤伴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大好头颅抛不得，神州残局岂忘君。”^②

人们可以讥评章太炎所受封建文化习染太深，人们也可以非议章太炎以国粹存亡绝续系于一身的谬妄；然而人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这种泣麟悲凤的伴狂后面洋溢着明显的革命叛逆精神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首先，在封建专制统治特别严酷的清代，麟凤作为一种图腾式的神瑞象征，似乎已为帝王圣贤所垄断。如果一个平民公然以麟凤自喻，便可能被看作是对于封建道统的僭越。章太炎当时已经在政治思想上与保皇派决裂，决心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所以 he 和其他革命知识分子一样，把这些所谓上下尊卑之类封建伦常视若粪土。他在爱国学社任教时，就曾故意以“×××本记”命题，布置学生写自传体作文^③。这些伴狂之举与骂皇帝为“未辨菽麦”的小丑，两者都是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道统的勇敢挑战。当时，清朝政府向英美租界会审公堂指控章邹的罪名就是“大逆不道”，但这类玩意儿已经不再能吓退爱国志士。他们在《江苏》第五期发表《大逆不道之解剖》一文予以反击，认为“大逆不道之名词，乃关于全群公益之律文，必非关于群中一人私益之律文也”。在民主国就“以置立君主为大逆不道”，而“割全群之产业以媚外人”的清政府，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是国民的公敌。“援泰西民约家征

① 《癸卯口中漫笔》，《国粹学报》乙巳年第8号。此句在《文录》卷1作“累于仇国，唯金火相革欤？”。

② 《复报》第3号。

③ 蒋慎吾：《爱国学社史外一页》，《大风》半月刊第6、7期号。

讨暴君之义,即反坐以大逆不道之罪,谁曰不宜?”义正辞严,针锋相对,反映出癸卯年入夏以后进步知识界革命意识的迅速涌发。

其次,庚子以后,章太炎已经自觉地逾越了“纪孔、保皇”二关。他虽然标榜国粹,但并非独尊儒学,实际上是把孔子与其他诸子放在同等地位而比较其短长的。他当年热衷的国学保存,主要地也不是抵制新学,而是为了抗御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激励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关于这一点,与他共患难的邹容是了解得很真切的:“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时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①由此可见,所谓泣麟悲凤,主要还是“忧国”之心,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与历史责任感。正是由于已经自觉地承担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所以章太炎于下狱之始,就充满自豪地向保守派新闻记者表明了革命的信念:“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②稍后,乌目山僧又发表《寄太炎》一诗,有“凭君不短英雄气,斩虏勇肝忆倍加。留个铁头铸铜像,羈囚有地胜无家”等句^③,抒发的也是同一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年爱国志士们这种难能可贵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是永远值得后世的人们尊重和发扬的。

第三,章太炎虽然流露了强烈的英雄史观和过于自信,但在癸卯前后他对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倒是非常尊重的。多年以后,他还回忆这段往事说:“余在巡捕房,与中山书,尊称之为总统,溥泉(张继)为余送去。”^④也在这一年,他还曾为黄中黄(即章士钊)节译的《孙逸仙》一书题词:“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嗑,掩迹

① 《狱中答西狩》,《复报》第5号,西狩即太炎。

② 《狱中答新闻报》,《苏报》癸卯闰5月12日。

③ 《江苏》第6期。

④ 《口授少年事迹》,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86页。

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他对孙中山的尊重，当然是由于己亥(1899年)、壬寅(1902年)两次在日本与孙交游，对孙有了较多的了解，而孙在章太炎向民主革命转变的过程中，也确实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孙中山由于与章太炎结交，由于章太炎、章士钊这些当年进步舆论界的佼佼者的宣传介绍，也明显地增强了自己在国内的影响。据章士钊自称：“癸卯八月，愚据日本官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成一小册子，颜曰《孙逸仙》，其时天下固懵然不知孙氏为何人也。”^①行老回忆往事，有时不免过于强调自己的作用，但上述这些宣传介绍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承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则是肯定无疑的。

第二首诗是对于“神州好男儿”邹容与“行行字字滴鲜血”的《革命军》的尽情歌颂。

乌目山僧与邹容的结识也是在爱国学社时期，但邹与学社的关系并不密切。他不是学社的“老社生”(即从南洋公学退学最早参加爱国学社者)，而是在癸卯春痛殴南洋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以后回到上海，才到爱国学社听章太炎讲学并与章同寓的^②。旧时学堂老生往往轻视与欺侮新生，即令像爱国学社这样进步的地方也未能例外，用章太炎的话来说，就是“陵轹新生如奴隶”。但邹容的性格是不容他人轻侮的。当时，他已经在东京学潮和张园拒俄会议等爱国运动中显示了锋芒，并且还得到许多进步老师的赏识和扶植，所以他对“老社生”毫不退让。章太炎早年曾回忆此事说：“是时余在爱国学社始识容，诸教员争与交。容性倜傥，喜骂人，谓诸社生曰：‘尔曹居上海，在声色狗马间，学英文数岁，他日堪为洋奴耳，宁知中外之学乎？’社生群聚欲殴之，乃去。以《革命军》一通

① 《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23号。

② 蒋慎吾：《兴中会时代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所记爱国学社社员132人名单即未列入邹容，另有柳亚子四人以中国教育会会员身份作为学社附读生，也不包括邹容。

示余，令稍稍润色之。余曰：‘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也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乃为叙录，与金山僧同仁刻行之。”^①“金山僧”即黄宗仰，出版费用大概全靠他张罗。因为爱国学社经费有限，对教员只供给简易膳宿而别无报酬，章太炎只有在课余为人译述“妖怪学讲义”之类，靠卖文以自给，似无余钱足以自行刻书。曾与章太炎同时任教学社的蒋维乔，回忆此事则说得更为清楚：“容篋中有小册《革命军》稿，太炎为之作序，宗仰出资刊行之。复将太炎之《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刊出，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②由此可见，《革命军》的早期得以流传，山僧也是颇有贡献的。

所谓“西州男儿有英骨，笔铁口血血茫洋”，是对青年志士邹容的刻画与讴歌。据蒋维乔同一回忆称，邹容尊章太炎为“东帝”而自称为“西帝”。这也许是借籍贯而作戏谑之言，但这位年尚不满二十的“西州男儿”的豪迈之气已可想见。《〈革命军〉击节》一诗中还有“海飞立兮山飞拔”，“昆仑吐气气郁勃”等句，大体上都是借用了《革命军》自身的语言，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之类。其实，这也并非邹容独有的性格特点，而是二十世纪初一代革命青年共同的精神风貌。与乌目山僧三诗在同一期《江苏》杂志上发表的，还有金松岑的《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寐，感事因作》长诗一首，其中也有类似的豪放不羁语言：“娶妻当娶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依身在法兰西。”^③这些都说明，长期桎梏于封建主义精神枷锁的中国

① 《革命评论》第10号。

② 《太炎先生轶事》，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66页。

③ 《江苏》第5期“文苑”，同时还发表松岑《补题二十岁海上钓鳌小影》，风格亦颇类似，如“革命风潮撼九天，太平洋海涨年年；不应袖却屠龙手，归约槌头缩项鳊”等。

知识分子,正在经历一次较诸戊戌维新更为强有力的思想解放。

所谓“一书英法真传译”,“咸识汉人有豪杰”,也是借用邹容《革命军》自序的语言,即“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吾不计。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在当时的进步思想界,邹容的年纪虽然最轻,但至少在《民报》创办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他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贡献却最大。正如癸卯5月14日《苏报》“新书介绍”一栏所说的那样,“《革命军》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绪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可以这样说,革命军的旗号与中华共和国的理想,从此为更多的先进中国人所共同抱持服膺。

当然,《革命军》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样,都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和对于国内民族关系的错误陈述,但这也是要从历史条件来加以理解的。在1903年,经过“拒法”、“拒俄”斗争以后,人民反抗的锋芒愈来愈集中到作为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的身上。查阅这个时期国内和海外的有关进步报刊,可以看出革命的或倾向革命的人们已经形成三点比较接近的认识:一是鼓吹革命排满的口号;二是宣传民族主义的“国魂”(即思想武器);三是塑造汉族共同祖先黄帝的形象;而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唤起人民推翻君主专制主义的清王朝。这似乎是一个极为离奇的现象,人民的革命觉醒随日俱增,而封建性的大汉族主义糟粕也愈来愈弥漫于革命者的语言文字之中。但问题也不难解释,其目的就是要把统治全国的满族王室和亲贵集团彻底弄臭,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对统治者的仇恨与鄙弃,以便通过革命一举而摧毁之。这就是当年革命的人们所说的,“欲达此莫大之目的”(指‘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

之宪章’),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向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地(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①而了解这一内情,我们就不会对当年排满的鼓吹者作过苛的责难。

第三首诗是为孙中山的远行壮别,作者对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导人寄予莫大的期望。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乌目山僧应是在癸卯夏季才与孙中山结交。这年闰五月(阳历7月),孙中山自越南河内,经西贡、暹罗抵达横滨,寄住在前广州博济医院同学廖翼朋开设的振华商店楼上。山僧慕名来访,孙“一见如故,雅向推重,特辟楼下一室以居之”^②,此后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孙中山在《江苏》杂志第6期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很可能就是由于山僧的敦促,因为他不仅是《江苏》的撰稿人,而且还是这家杂志的重要资助者。如果不是他及时在上海筹得款项接济,《江苏》早就倒闭了。孙中山于癸卯8月初6离日赴檀香山,行前山僧曾借助旅费200元。《钱中山》诗首句就是“握手与君五十日”,可以推算出他与孙中山的结交当在癸卯6月16日左右。

在这五十天当中,孙中山不仅与乌目山僧,而且也与其他一些因《苏报》案避祸来日的爱国学社成员友好往还。这些交往肯定增加了孙中山对于国内(特别是江浙地区)情况的了解,而与保皇派的斗争则显然是议论较多的问题之一。因为孙中山本人公开与康、梁之流论战,正是在癸卯日本之行以后。同年10月29日(阳历12月17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曾就所询社会主义问题复函友人,这个友人很可能就是乌目山僧。信中特别称赞“革命军”“功效

① 竟庵:《政体进化论》,《江苏》第3期。

② 冯自由:《乌目山僧黄宗仰》。